

4

绿瓦红墙，青松翠柏，古朴典雅的古老殿堂安静矗立。这里是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现场教学点——孟庙、孟府。2018年1月8日，是伟大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四十二周年的日子，按照教学的安排，我和同学们怀着对周总理和孟子先圣的崇敬之情，来到了孟庙、孟府，感受儒家文化的意蕴，品味先哲的思想。

孟庙又称亚圣庙，正南门为“棂星门”，是孟庙第一座木架结构门坊，四柱三洞，雕梁画栋，色彩绚丽，重檐斗拱，凌空欲飞，高大威严。门内东西两边各建一木坊，东书“继往圣”，西书“开来学”，以此表彰孟子对儒家学说有“承先启后，继往开来”的卓越功绩。

进棂星门，为孟庙第一进院落。院落北壁正中是座精雕细刻的石坊，为“亚圣庙石坊”，也是孟庙第二道门。穿过亚圣庙石坊，便进入孟庙第二进院落，院中古老的苍松翠柏，翳天蔽日，虽历经沧桑，依然枝干挺拔。

走过院中青砖甬道，直通“仪门”。这是一座三启门洞的高大门楼，门额上悬一竖匾，上书“泰山气象门”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，故仪门又称泰山气象门。

“泰山气象”四字取义于程子之说，“孟子岩岩泰山气象也”，说的就是孟子的浩然之气。孟子认为，浩然之气是极为伟大、极为刚强的，如果用正确的方法去培养而不去伤害它，那么它将充满于天地宇宙之间。具体的讲，浩然之气就是居仁、由义、守礼，要讲仁义、重礼节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这就是孟子心目中的大丈夫，也就是说，浩然之气也可以称为大丈夫之气。它是一种舍生取义的勇气，它是一种敢于担当的豪气，它是一种坚忍不拔的骨气。

两千多年来，孟子的这种浩然之气，经过历代先贤志士的弘扬与践行，逐步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脊梁！晚清名臣曾国藩认为：“欲成大事，必须通过养浩然之气。”现代儒学大师牟宗生先生说，孟子之学就是大丈夫之学。自孟子之后，中国人的血脉便不缺钙了。

今天，浩然之气作为做人的一种气节，一种定力，依然散发着时代的光辉。习总书记曾经说过：“党的干部只有一心为公，事事出于公心，才能光明正大，堂堂正正，有了这股浩气正气，就能坐得稳、行得正、走得远！”

越过泰山气象门就是孟庙的第三进院落，此院东西各有门通往庙外，是平常出入孟庙的通道。院落北壁又三门并列，中为“承圣门”，东为“启贤门”，西为“致敬门”。“承圣”二字，取孟子上继舜禹汤文武周孔统绪之含义。而“启贤”则含有赞颂孟母有“自毓圣贤”之贡献的意思。

孟母仇氏，在孟子三岁丧父后，她克勤克俭，含辛茹苦，坚守志节，并从慎始、励志、敦品、勉学、约

养浩然之气 树仁义之德

◎ 祁云霄



礼等方面对孟子进行教育。既成就了孟子的“亚圣”地位，更为后世留下了可贵的教子之道。 其“三迁择邻”、“断机教子”的生活代代相传，在中国历史上受到普遍尊崇。孟母不仅在孟子幼年时期给予敦敦教诲，孟子成年后，也从母亲那里受益良多。有一个“拥篲而叹”的故事，讲述的就是对孟子成年后的影响。后人把他与陶母(东晋名将陶侃母亲)、欧母(欧阳修母亲)、岳母(岳飞母亲)一起誉为“四大贤母”。

在承圣门左侧，竖有“孟母断机处”、“孟母三迁祠”两通石碑，见证了“至今东鲁遗风在，十万人家尽读书”。孟母教子的故事启示我们：在干好工作、追求事业有成的同时，要注重教育好子女，树立良好的家风家教。二者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，方可谓人生圆满。

在承圣门右侧的“致敬门”内，有一块四面碑，

此碑没有碑首与碑座，碑身方柱体结构，四面刻字，每面突出一个主题，分别篆刻着仁、廉、公、勤四项箴文，又被称为“仁廉公勤”官箴碑。碑文以凝练优美的语言，道出了为官从政的真谛。

对“仁”的阐述，碑文中列举了上古时期仁德的典范，如大禹和后稷，他们关心百姓疾苦，爱民如子。与此相反，碑文也列举了一些不仁官员，他们对百姓漠不关心，冷酷无情。两相对照，阐述了施行仁政的重要性。

对“廉”的阐述，碑文中写道，廉洁是官员最宝贵的人格品质，还提到东汉杨震“四知却金”的故事，告诫官员在廉洁方面应坚持“慎独”，从内心真正约束自己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够仰俯无愧于天地。

对“公”的阐述，碑文采取对比的方式来说明坚持“公”的意义，周朝大师尹吉普亲亲戚、近小

人，故为政有失偏颇；三国辅臣诸葛亮开诚心、布公道，遂终成一代名相。说明了，“唯公生明，偏则生暗”。

对“勤”的阐述，碑文中写道，一个勤政的官员应该做到：“炎汗浹背，日不辞难；警枕计功，夜不遑安。”白天应辛勤工作，夜晚应反思对错。“谁为我师，一范一轲”。勤正的典范当属北宋的两位名臣范仲淹和韩琦。

“仁廉公勤”四面官箴碑启示我们：仁为官之本、廉为官之魂、公为官之义、勤为官之功。

进入承圣门，便是孟庙的第四进院落即中心院落，分为东、西、中三路。孟庙的主体建筑“亚圣殿”就坐落在院中高台之上，大殿重檐之间，高悬一匾，上书“亚圣殿”楷书贴金大字，四周环绕以精雕的五条金龙。殿之正面朱楹并列，正中门额上悬挂“道阐尼山”横匾一块。殿内承以八根巨型朱

1930年5月间,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,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。大会结束后,49名代表被陆续护送出上海,然而,其中一人又悄悄潜回上海,投入到国民党的怀抱,成为卑鄙无耻的叛徒,他就是黄第洪。

黄第洪从家乡扬州回到上海后,看到国民党到处吹嘘“剿匪胜利”,他便对革命失去了信心,决心叛党投敌。于是在闸北区的一个客栈里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密信,以学生的身份告诉“蒋校长”,他在共产党那里很不得志,愿意改过自新重新追随校长,恳请校长拨冗接见。黄第洪称,最近周恩来准备会见他,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协助国民党特务抓住周恩来。信中还有联系地址,希望国民党方面尽快与他接头。

蒋介石看了信不禁喜出望外。过去悬赏重金都没有能够抓住周恩来,而现在机会却送上门来了。他立即召见特务头子陈立夫,要他务必切实办理。陈立夫自然不敢怠慢,立即批转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处理黄第洪自首案,严防走漏消息。

接到案卷后,一脸梦幻的徐恩曾时而蹙眉沉思,时而闭目遐想,时而嘿嘿自笑,像个完全沉浸在自己内心世界里的疯子。他深知此事非同寻常,决定选派一名最可靠的人与黄第洪接头,想来想去,他最后选中了驻沪特派员杨登瀛。

杨登瀛是中共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卧底,他拿到黄第洪的效忠信后,立即通报给中央特科。中央特科一查确有黄第洪其人,而且还是周恩来直接联系的人,不禁大吃一惊。

陈公博临刑之前……

陈公博的一生波澜起伏,政治面貌变化多端。他首先是中共“一大”13名代表之一,又于1922年脱党,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;在抗战期间跟随汪精卫搞所谓的“曲线救国”叛国投敌,成为中国的第二号大汉奸;汪精卫死后成为其继承人,伪南京政府主席,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。

陈家原籍福建上杭,后移至广东北部山区乳源。从陈公博的祖父开始举家迁居广州。陈公博之父陈志美早年从军,是清朝军队的一名武官。据陈公博自述,其父因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而官至广西提督,1897年解职后,闲居广州,继续享受清朝俸禄,并保留官职称谓。这是一个荣华富贵的官宦之家,陈公博在这样的家庭中度过了他的童年。

1945年8月15日,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,陈公博宣布解散南京伪国民政府。最初陈还希望能得到重庆接受,但最终逃亡日本,并试图在当地隐姓埋名。中国政府发出了对陈公博的通缉令,并在南京受降后即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。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连自己本国的战犯都无法保护,更别提保护陈公博了,只能将其交出。

陈公博被押回中国,交由军统看管。1946年4月在苏州狮子口的江苏高等法院受审。4月12日,以通

谋敌国罪成立,处以死刑,并被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,等待执行死刑。6月3日执行枪决。

陈公博临刑前将一小茶壶赠予汪精卫夫人陈璧君,并说:“夫人,我先走一步,随汪先生去了。牢中别无长物,这把茶壶送您,权作留下纪念吧。”陈璧君痛哭失声。

在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,法警临刑前要陈公博在判决书上签字,特意送给他一瓶容量约半斤的白酒给他喝,使他减轻行刑前的痛苦。陈公博接到判决书后长叹一声,连呼:“完了,完了。”就签了名,但是把白酒还给法警,摇摇手说:“不必,不必。”

陈公博临刑前问检察官:“今天谁给我执行。”还当面乞求法警:“请你打得好一点,不要太破相。”知道要执行了,陈公博还强作镇静,伸出手来与各检察官一一握手,连称:“再见。”而各位检察官竟然忘了自身应该保持的尊严,争着和这个罪大恶极的大汉奸握手。

当他被押到苏州狮子口监狱后园时,身子还没有站定,正在问法警:“站在哪里?”法警已从他背后向他的后脑壳开枪。子弹从后脑壳射入,右额射出。

这位大汉奸就这样结束了罪恶的一生,时年54岁,最终被打上历史耻辱柱。(摘自《时光记忆》)

中央特科的一次秘密行动

闲自在。只是家中人丁稀少,老太太颇有些凄凉之感。

黄第洪敲开姨妈的大门,老太太见自己的外甥出息得一表人才,神气十足地走到自己面前,乐得嘴都合不拢了,根本不问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,就高高兴兴地留他住了下来。

6年前,表妹玉香还是个黄毛丫头,站在黄第洪面前惹起地什么也不会,而那时的黄第洪,一个十足的流浪汉,玉香也没真正看得起他。如今,玉香出落得亭亭玉立,19岁的大姑娘又受过良好的教育,站在黄第洪眼前落落大方,谈吐自然,极有修养,那娇美的面容和充满青春活力的身段,一下子就抓住了黄第洪的心。两人一见钟情,出双人对,整日形影不离。膝下无子的姨妈更乐得外甥做女婿,亲上加亲,喜滋滋地张罗着女儿的喜事。

没想到在一个深夜,黄第洪竟被他的姨妈赶出了大门。他不但没做成姨妈的乘龙快婿,竟又一次沦落成流浪汉。

原来,6年前黄第洪流落上海时,曾结交几个狐朋狗友。这次回来,他瞒着姨妈去和老相识们逛堂子,进赌场、下餐馆。为了过上天花酒地的生活,他竟从姨妈家里偷出十几根金条。姨妈发现后,气得差点昏死过去,醒来的第一件事,就是让

他立即滚出家门。

离开姨妈家,黄第洪仍没有去苏北地区工作的意思。在闸北区的一个小客栈里,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,说自己回到苏北后身份暴露了,敌人追捕得很紧,搞得自己没有立足之地,不得不返回上海,请周恩来无论如何中央机关里给他安排一个工作。

周恩来虽然工作异常繁忙,还是马上给他写了回信,约定同他见面细谈……

杨登瀛以国民党驻沪特派员的身份与黄第洪确立了接头的时、地点与暗号。7月14日上午10点,杨登瀛一只手拎着皮包,另一只手拿着当天的《上海日报》,准时来到南京路邮局。但是他在邮局大厅里坐了半个小时,始终不见黄第洪的影子。3天以后,同一时间、地点和暗号,杨登瀛又去接头,结果还是白等了半个小时。

经过两次试探和暗地监视,黄第洪终于决定会面。又过了三天,黄第洪与杨登瀛接上了关系。急于表明自己“诚意”的黄第洪向杨登瀛交代了自己与周恩来的关系,供出了已经约好的周恩来跟他见面的时间和地点,并且主动提出下一次会面时,把周恩来的亲笔信拿来。杨登瀛与黄第洪分手后,感到情况严重,直奔中央

漆大柱,迎门两柱正面凸镌一副巨型抱柱对联:“尊王言必称尧舜,忧世心同切禹颜”。

这副对联用来赞誉孟子,推崇王道必称尧舜,忧世之心如同禹颜。“忧世之心”就是看到百姓疾苦,于心不忍,心生忧虑。在孟子看来,作为为政者仅有仁心是不够的,还要做到仁民,就是要用内心的这种“仁”去善待百姓、重视百姓。并在孔子重民思想的基础上,率先提出了“民为贵、社稷次之、君为轻”的观点,把民众放在重要位置。孟子的“民重君轻”思想受到历来统治者的重视。

“仁政”是孟子的核心思想,他把孔子的“仁学”运用到政治上,勾画了一幅完整的“贵民”、“富民”、“教民”、“乐民”的仁政蓝图。孟子提出的“制民恒产”、“省刑罚”、“薄税敛”等仁政方略,目的是增加百姓收入,藏富于民。孟子说,“乐民之乐者,民亦乐其乐;忧民之忧者,民亦忧其忧”。此外,孟子还提出了“民事不缓也”、“政得其民”、“养教合一”等一系列仁政主张,成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史上的重要亮点。尽管孟子已经离开我们二千三百多年了,但他的千古圣训,仍然余音绕梁。

出了孟庙,我们又去了孟庙西侧的孟府。庙、府仅一街之隔,是孟子嫡系后裔居住的宅第。走过礼门义路,来到了孟府的主体建筑,孟府大堂。

大堂檐下的“七篇始矩”匾匾,由清雍正皇帝手书。“七篇”指的是《孟子》一书由七个篇章组成,在此代指孟子的仁义思想。“始”是赠与,“矩”是规矩。七篇始矩的意思是说,孟子的仁义思想是赠给后人做人做事的规矩。

在大堂两侧各有一件物器,一个叫日晷,是我国古代的计时器,靠太阳的移动来测量时间,体现自然之道;另一个叫嘉量,是我国古代的标准度量衡,代表人们的行为尺度和规范。只有用标准的尺度和规矩,去衡量和约束人们的行为,才能使人们知敬畏、知进退,才能使人们更好地去懂规矩、守规矩。

孟子认为,义是一种内在的规矩,靠的是自律,礼则是一种外在的规矩,靠的是他律。古有规矩治家,今有规矩立党。我们党历来重视规矩建设,从井冈山的“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”,到西柏坡的“六条规矩”,再到如今的“八项规定”、“全面从严治党”、“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”,每一项规定的提出与落实都在不同历史时期穷究,巩固了我们党政治的根基。

今天,我们怀着敬仰之心,沐浴在孟子仁义思想的光辉当中,深感规矩对立党治国的重要性。在政德老师们的讲解中,大家一路走来,仰望泰山气象门、驻足亚圣殿、品读官箴碑、走过“礼门义路”……既领略到孟子高远刚健、勇于担当的大丈夫气概,又体会到他仁政爱民的博大情怀。重温了千年圣训,回想起来,句句发人深省,耐人寻味,给我们增添了无限的正能量。

作者单位:县委巡察办

特科报告。

周恩来得到特科的报告后,作出两点指示:第一,先将黄第洪暗中隔离,切断他与组织的一切联系。第二,特科继续加紧调查,尽快弄清情况。

7月26日,就在周恩来约定同黄第洪会面的当天早晨,黄第洪接到杨登瀛的手令:“十一。城隍庙西街口,务将家伯亲笔信带来。堂兄。”

黄第洪冲一样准时来到城隍庙的西街口,站在树荫下胡思乱想。很快就要升官发财了,他的心跳加快,一种惊喜涌上心头,他被彩色的幻梦折腾得意乱神迷时,只见一队轻骑由东向西飞驰而来,随着“咄”“咄”两声清脆的枪响,两颗子弹已经穿过了他的胸膛。

中央特科干净利索的行动,把国民党特务们震惊得简直无法相信。徐恩曾亲自到上海检查工作,对杨登瀛忧心忡忡地说:“活见鬼,共党的消息怎么这么快呢?”

杨登瀛若有所思地说:“这次我小心又小心,还是让共党抢先了一步”。

“可惜的是到手的大鱼又跑掉了,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?”陷入沉思的徐恩曾眉头挤出一个川字:“好几回了,他周恩来总能死里逃生……”

“这回我算是领教共党的厉害了。我总感觉那两枪中的一枪是为我准备的,我是捡了一条命啊!”杨登瀛说。

徐恩曾点头,不无庆幸地说:“真是不幸之万幸!你要是有个好歹,那损失就更严重了……”

(据《周恩来遇险实录》)

毛泽民顺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300元钱,甩在桌子上:“拿去好了。我身上只带了这些,是准备买纸的。其余的,只有等我出去再说!”

见毛泽民出手大方,几个“包打听”互相看看,有些不知所措。

那天,毛泽民夫人钱希均正好外出办事,刚到弄堂口,便发现情形不对。她立刻将毛泽民被捕和工人们被关押的情况报告给中央特科。中央特科负责人周恩来紧急部署了营救工作。他批准可用3000到5000元,保全数十位工人同志和价值1万余元资本的工厂。但经过毛泽民与“包打听”软硬兼施的“谈判”,用“天下皆朋友”的江湖套路,只送给他们800元,就化解了这场危机。

基于协盛印刷所发生的异常情况,党中央认为,毛泽民已经不宜继续留在上海,协盛印刷所已经暴露,必须及早转移。

1929年冬的一天,上海《新闻报》刊登了一则启事:“协盛印刷所厂主杨杰出卖印刷设备。”印刷所门口也张贴了同样的告示。这批印刷设备包括:对开印刷机一台,脚踏印刷机、切纸机、装订机各一台,以及各号铅字和工装夹具等。

几天后,一位陌生的新“主顾”看了货,请人装箱,打包,干净利落地把这些设备全拉走了。协盛印刷所连同它的“杨老板”,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上海滩消失了——这是毛泽民的“金蝉脱壳”之计。他把印刷所的设备全都“卖”给了自己。

这批印刷设备很快转移到了天津。毛泽民和钱希均一到天津,就在楼门口大大方方地挂上“华新印刷公司”的招牌。鞭炮一响,印刷机就运转了起来。

从此,毛泽民辗转京津,先后易印刷厂址,以极其巧妙的斗争方式坚持工作,及时印刷党的文件和党报、党刊,安全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。

(据《名人传记》)

20年代中共中央秘密

印刷机关被巡捕搜查始末

险恶的环境中顽强地坚持着,他们随时都有遭受通缉和逮捕的危险。敌人绞尽了脑汁,总是切不断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的印刷和发行。一个秘密印刷厂被敌人破坏后,党刊的印制很快又转到另外的秘密地点继续进行。

当年,党中央最大的秘密印刷机关——协盛印刷所设在派克路,毛泽民兼任这个印刷所的负责人。他几乎每天都去印刷所上班,亲自安排各项工作。

1929年夏天的一个上午,20多个巡捕房密探——“包打听”突然闯进印刷所,发现车间里正在印刷共产党的宣传品,便立刻封锁了弄堂口,对印刷所进行搜查。

领头的“包打听”令人给毛泽民戴上手铐,押到一个旅馆里向他敲竹杠,开口就要1万元作为赎价。在上海滩闯荡多年的毛泽民,从容不迫地用地痞流氓的套路对付他们。他左手叉腰,右手的大拇指向外一撇,摆出一副“老开”的派头:“你可以打听一下,在大上海,在商界、出版界,哪个不晓得我杨某人?”

“包打听”趁机敲诈:“好啊,那你就拿出钱来吧!”